

# 哲学符号学



## “道”与“在”：关于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的符号学反思

张杰 余红兵

**摘要：**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从真理存在的方式切入，通过语言表征的“遮蔽”与“去蔽”的关系，力求让真理在语言的表述中“敞开”。然而，他的语言本体论依然沿着探索真理的传统路径，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没能让语言脱离表征危机。如果从老庄的道家学说出发，与通常的真理探索之路相反，返回自然，打破固有体系和现存观念的束缚，也许能够更接近包含所谓真理在内的“道”，让语言的本质和真理能够更加自由地“在”。本文从对真理存在的质疑、意义的自反生成和言说的间离作用三个方面，来反思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以期把语言存在研究引向深入。

**关键词：**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道言观，精神文化符号学

### “*Dao*” and “*Being*”: A Semiotic Reflection on Martin Heidegger’s Linguistic Ontology

Zhang Jie Yu Hongbing

**Abstract:** Martin Heidegger’s linguistic ontology start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ruth exists, aiming to reveal the truth in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alment” and

“unconcealment”. However, his linguistic ontology continues to follow the conventional path of exploring truth and attempts to solve unsolvable problems without liberating language from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Departing from the Daoist philosophy of Laozi,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path of exploring truth, the return to nature, which break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inherent systems and existing concepts, may bring us closer to the “*Dao*”, encompassing what has often been referred to as truth. This approach might allow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truth to manifest more freely. The present paper critically reflects on Heidegger’s linguistic ontolog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questionable existence of absolute truth,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meaning generation, and the distancing effect of discourse. The aim is to lead research on the being of language toward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Keywords:** Heidegger, linguistic ontology, views of *Dao* and languag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05

对知识乃至真理的求索，可谓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而科学研究似乎也就是在这个求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然而，当代符号学告诉我们：任何知识都取决于它们的符号媒介种类，即“知识与其表征方式不可区分”（Sebeok & Danesi, 2000, p. 11），这注定了人类对于所谓真理只可能无限接近，而无法最终企及。在科学与人文的研究中，一个结论得出之后可能会遮蔽其他的意义生成，直到被新的认识否定，继而再开始新的遮蔽，难以尽之。两千多年前，庄子就曾指出这个困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王先谦，楼宇烈，2013, p. 36）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的探索之路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方向的可能性？在不断积累知识和求索真理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改变路径，反其道而行之，打破现存知识、伦理和思维模式的限制，重新思考真理存在的问题？

“破”比“立”的道路要更加坎坷曲折，但在这方面，古今中外不乏其人。本文选择谈其中一个特别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这位思想家之所以特别，主要在于他所主张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本体论。海德格尔从真理存在的方式切入，通过语言

表征的“遮蔽”与“去蔽”的关系，力求让真理在语言符号的表述中“敞开”，因为“语言是一种敞开，特别是诗性语言”（希尔贝克，2016，p. 638）。这也就是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的核心思想。相较于其他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了不起的，他在语言表征功能之外，试图诗意地传达根本的东西，即本真（希尔贝克，2016，p. 639）。然而，这位诗性哲学家的语言本体论，并没有让语言脱离表征危机，因为他在根本上所因循的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老路。

在我们看来，一切被认知的客体对象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甚至能够先于作为主体的人发出信息（张杰，余红兵，2021，p. 10）。认知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难以用简单的肯定句来表述。真理也很难是独立于人、恒久不变的实体。也许从老庄的道家学说出发，与通常的真理探索之路相反，而返回自然本身，打破固有体系和现存观念的束缚，才能够更接近包含变动不居的真理在内的“道”，让语言的特质和真理更加自由地“在”。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将从对真理存在的质疑、意义的自反生成和言说的间离作用三个方面，来反思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以期把语言存在的研究乃至真理的探索引向深入。

## 一、“道”与“问”：对“真理存在”的质疑

“真理”存在的方式问题，是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主要探讨的问题。海德格尔一直视语言为一种“缘在”（Dasein）<sup>①</sup>。从1934年起，海德格尔把这种“缘在”更进一步阐释为一种自身缘构（Ereignis），“即一切真实的存在都是在相互引发中成为自身和保持住自身的。语言与在也是在这种缘构中获得自身的”（张祥龙，2001，p. 248）。有趣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在与道家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完善的。他在《论真理的本性》的初稿（1943）中就引用过《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也就是“真理永远离不开非真理，光亮永远以黑暗为前提和根源”。虽然在正式出版时，他因不能够用中文来阅读老子的论述而删去了这段话，但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他。这位德国哲学家正是在与老子道言观对话的基础上，把语言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本体、自身相互作用的关系网，而并非只是一种作为交流手段的符号系统。

---

<sup>①</sup> 关于 Dasein 的汉译，我们认为张祥龙（2002）的“缘在”较为精到。

海德格尔后来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就阐释了自己对“道”的理解：“老子的诗意图思的引导词语叫做‘道’（Tao），‘根本上’就意味着道路。”（2020，p. 191）但如此理解，似乎并不适合“道”的内涵，并不令海德格尔满意。他又指出：“因此，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p. 191）再经过概念上的调和，海德格尔得出：“‘道’或许就是为一切开辟道路的道路，由之而来，我们才能去思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也许在‘道路’、‘道’这个词中隐藏着图思之道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的未被说出状态之中而且能够这样做的话。”（p. 191）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对“道”的理解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道理，即构成真理的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二是通往真理之路的道路。他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相关论述，也正是从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前者决定了他的语言本体论必然从存在之维揭示语言的本质，而后者则使他经由“敞开”之视角，探索通往语言之径，且“永远在路上”。一言蔽之，就是“在语言与存在的联系中对语言作形而上学的思考”（p. 91）。

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度渊源，可能是理解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的关键。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的“道”与真理，张祥龙（2022，p. 162）曾有精彩洞见：“认识真理主要不是克服主客异质而达到普遍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些动态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有无相交缠的生成之处来理解、对付、预知生成变化的结构、趋向、节奏和样式。”海德格尔与道家学说结缘数十载，在1946年夏甚至与中国翻译家萧师毅一起翻译《老子》，想必清楚这一点。他自己的语言本体论，无疑受到了老子道论的影响。老子名言：“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楼宇烈，2016，p. 1）“道”是说不明白的，因此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可能并非要阐释语言的概念或定义，而是想让语言的本质呈现出来，即“在”，从而使“道”也“在”：“我们必须倾听语言，这样，根本的东西就会对我们言说。”（希尔贝克，2016，p. 638）

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是领会了老子的道论的，包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楼宇烈，2016，p. 64）。虽然无法通过语言说明“道”，但“道”是依从自然的。因此，海德格尔以“去蔽”的方式，尝试消除言说的各种“遮蔽”的可能性，让所言说对象能够尽可能处于自然状态。然而，任何以“去蔽”的表达方式来消除语言的“遮蔽”现象的企图，都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对此，海德格尔本人也十分清楚：“作为这样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构成域，语言无法再被还原到任何存在者，不管它是符号

## □ 符号与传媒（29）

系统、观念表达，还是交流活动。”（张祥龙，2001，p. 249）更不用说，世界上任何关于语言的知识或规律，都不可能是永久恒定不变的，更不可能是超越时空变化的固定组合，只能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意义衍生机制。换句话说，“语言”应作动词解，即“语言活动”或“语动”（languaging）（Cowley, 2019），它更可能是主体选择意义，从而构建其直接经历的意义现实的构义仪式（余红兵，2024b）。

从方法论来看，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与传统的语言工具论的研究模式还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在揭示语言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围绕“遮蔽”（黑暗，即非真理）与“去蔽”（去黑）的“敞开”（显白，即真理），尝试显示语言的存在本质，而后者一般则是把语言视为人类交流的工具。两者均是按照“获取”知识与真理的模式展开的，也是长期以来学界研究语言的主要思路。此外，海德格尔的“敞开”超过了一定的度，即没有还原语言的自然状态，而是采取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语言的“自身缘构”。这样必然会导致语言丧失自己的形态，就如同一个人本来是一个独一无二、具有审美感的自然生命体，经过科学仪器拍了张 X 光片，反而丢失了自我，也就并非原本真实的存在了。海德格尔的初心是呈现语言的存在本质，却因此走向了反面。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海德格尔“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的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2020，p. 2）。他认为：“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话。”（p. 2）“在这条通向说话意义上的语言的道路乃是作为道说（Sage）的语言。……道说即显示。”（pp. 256 – 257）显然，海德格尔突显了语言作为独立存在其自身的主体性，而并非人的心灵表达的工具。然而，这条语言存在本质的探讨之径或许值得重新思考，其通往语言“敞开”的道路可能还是产生了方向性的错误。既然绝对客观的真理无法企及，那么是否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放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视域，所谓“语言”“真理”“道”，其实都不是第一位的，处于第一位的是自然（张杰，余红兵，2023）。关于自然，应该采取尽可能维护其原样的方式来看待，也就是返回自然形态，而不只是用科学分析的透视方法来探究。然而，究竟应该如何返回自然呢？既然科学剖析不能够维护原样，肯定句式的语言表述又会导致“遮蔽”现象，那么是否应该用疑问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提问和对现存理论或曰“真理存在”的质疑，来推进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探索呢？

人类的认识是在不断更新所提出问题的基础之上前进的。比如，古希腊

罗马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思路放在语言上，就变成了问“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各个语言学流派几乎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始自笛卡尔经由康德的“认识论转向”，又使得很多人认识到所谓“本质”是无法企及的，因此问题改为了“认识世界何以可能？”放在语言上，“如何认识语言？”就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新重点，并由此引生了新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入20世纪，人们又发现，任何认识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语言表述来实现的，因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问题又变成了“怎样用语言来表述我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到了20世纪后半期，人们又开始意识到，语言可以被视为文化实践。任何语言表述似乎都离不开文化权力场，因此出现了“文化哲学转向”，问题又转变为“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下表述所知晓的世界本质？”对语言本质的探讨也是在这些转向中不断更新和前进的。任何以“语言的真理存在”为目标的探索，都是在对前人结论的质疑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得出新回答和新方案。解决问题不是为了终结探索，而是为了提出下一个问题，是新的探索的开始。换句话说，对语言之“道”的持续寻求，使语言之“问”不断出现，这是研究的必然（无论是所谓“科学”还是所谓“人文”）。

## 二、“道”与“意”：意义的自反生成

在当今主流语言学界，语言被广泛视为一种符号运作机制，或内在或外在，争议不休，但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语言是类似于棋类游戏的结构系统，而意义的生成就是这一系统运行的结果。在海德格尔那里，该系统不仅是人用以交流的工具和符号系统，更是一种“自身缘构”，即“原本的、纯显现的存在论域或发生境域”（张祥龙，2001，p. 259）。这里至少存在两层含义：一是缘构之源，即信息本源的拥有者和发生者；二是两个对立面互动的内在机制。不妨认为，这是海德格尔的语言之“道”。张祥龙（p. 259）指出：“这道与最根本的实在（‘存在本身’、‘至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相互引发的构成关系。海德格尔称之为‘Ereignis’（自身缘构）。在道家则是通过‘反者，道之动’的种种方式而显现，比如‘阴阳相冲’、‘有无相生’……”

诚然，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观的形成，明显受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两个不同文化领域思想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首先是生长在西方的知识话语语境中的，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

## □ 符号与传媒（29）

哲学传统的深刻烙印。可以说，海德格尔主要采取的是西方哲学的思维范式，试图通过语言言说的“敞开”来呈现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以体系内部的“遮蔽”与“去蔽”的关系，来实现语言意义生成的多元。其语言本体论就建立在认识存在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以揭示真理为目标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即意义取决于语言体系内部的关系。

但正如爱沙尼亚哲学家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斯托罗维奇（Леонид Наумович Столович，1929—2013）在《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所强调的，西方哲学的特征与东方（包括俄罗斯）哲学不同。前者是一种知识理论，以认识论为特征，后者则以艺术审美和宗教信仰为基础（Столович，2005）。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чала целевого знания，1877）中也曾明确指出，西方哲学采取的是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理性与经验”的对峙中来认识世界，而且把人类的真理探索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肯定是明显不足的，甚至会导致西方哲学陷入科学实证主义的危机，根本无法触及“万物统一”的“完整知识”。“完整知识”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应该加入“神学”，即研究精神的学科。“只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舍此，则科学、哲学和神学只能是知识的个别部分，即被割下来的知识器官，因此和真正的完整真理毫无共同之处。”（索洛维约夫，2000，p. 195）当代俄罗斯知名学者伊·阿·叶萨乌洛夫在《俄罗斯经典：新理解》一书的序言中也指出：“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对待研究客体的基本态度可以分为两种：针对研究对象的这种或那种的外部阐释，以及对于现象所需要的内部理解。‘研究’绝对不是‘理解’。如果说‘研究’既存在于人文学科，也存在于非人文学科，那么理解就是‘精神学科’所特有的”；“一般对待客体对象持两种态度：‘物体’‘个性’。与此相对应的前者是‘自然的科学属性’，主要是知识的独白形式，后者则是认识的对话积极性，前者是规律，后者是精神”。（Есаулов，2017，p. 7）从学科的方法论来看，海德格尔虽是诗性哲学家，但仍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把语言作为对象，而并非从“人类精神”的关键视角来理解语言。

涉及人类之精神，我们的研究对象便不再是“一个个没有生命力的‘个体’，而是活生生的‘个性’。任何试图给符号以确定意义的研究都是在约束作为‘个性’的符号自由”（张杰，余红兵，2021，p. 10）。意义的生成除了体现为人类符号表征体系的运行，更主要的是来自自然，即源自自然的作用。

人作为认知主体，是本然的阐释性动物，但并非完全独立的认知行为发出者，而自然正是认知行为的始作俑者。如果没有南北极冰山的融化、臭氧空洞的形成等大自然发出的信息供人类作为阐释的对象，人类也许还不会主动去保护自然生态。而且，任何意义的产生，都会生成与自身意义相反的意义，即意义的“自反生成”。《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王弼，楼宇烈，2016，p. 110）这里的“反”字体现的是一种逆向的因果结构，老子把它视为“道”的原动力以及运行的方式。

在海德格尔那里，意义的自反生成还只是在语言系统内部。受老子道言观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2020, p. 253）。在海德格尔看来，“道说（Sagen）与说话（Sprechen）不是一回事。某人能说话，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概无道说。与之相反，某人沉默无语，他不说话，但却能在不说中道说许多。”（p. 251）这种道说是先于任何二元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也正因为如此，语言并非人的一种简单话语表达，而是一种先于人的表达的自我存在结构。“自身缘构”的提出，其实就是要避免概念表象或具体言语的“遮蔽”，从而达到至道的“敞开”境界。语言在缘构中摆动，以此形成动态的意义。不过，海德格尔所说的“自身缘构”还是在自我层面意义上的，即同一层次上的正反对话衍生意义，让对话来消解语言的“遮蔽”现象。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是通过对话互动，在意义的不确定中，通过“去蔽”的方式，来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读”，从而尝试与道家的“道不可言”相通。

其实，“道不可言”即便在道家思想中也有不同理解。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均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不能够用有限的语言去把握无限的“道”。但在庄子看来，“道不可言”并非“道”与“言”的绝对对立，更不只是语言体系内部语法、词汇和发音所形成的并由此可能导致的表意“遮蔽”现象。反而是在语言体系外部，使用语言交流之人的自负，才是造成“遮蔽”或“误读”的最大原因。颜世安在《游世与自然生活》（2022, p. 294）中指出：“庄子其实并非真的认为道不可言，并非真的认为道与言绝对对立，道的特征像禁忌一样不可以用语言冒犯。庄子实际上是认为语言表述中通常会有的确定与自负的态度，才是要害。”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主要是在与老子交流，而庄子最终提出的言道方式，是老子《道德经》并没有特别强调的。在老子那里，“道可道，非常道”还只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即语言观；在庄子这里，这已经是一种世界观的问题，关系到对待世界的态度。人类只有克服自身的自以为是，瓦解现存的知识体

## □ 符号与传媒（29）

系和社会伦理观念，才能够真正做到“去蔽”和面向未来，实现语言言说的“敞开”。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虽然是通向真理的基础，但同时也会限制人的思维，捆绑人的手脚，只有不断突破这些理论、观念和实践的束缚，人类社会才可能进步。今天的社会无疑是新社会，相较过去的旧社会而言，肯定是要发展了，但是对于明天的社会来说，它确实又是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

这种克服自我<sup>①</sup>的“去蔽”实际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知识积累的真理探索之径，即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破旧立新；另一条则是逆向而行的返回自然之路，即摆脱现存社会伦理观念和研究束缚的羁绊。这两条路径都要尽量避免用肯定叙述的终极断定，而应主要采用不断提问的方式，来推进人类之文明。以知识和真理为目标的探求，也应该以克服人的自负和回归自然为目的，这样才能把语言言说由意义的确定和传输，转变为“意义的释放”。在这里，意义自反生成和“遮蔽”与“去蔽”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是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关键转变。从这一点来看，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语言本体论的局限是明显的。不过，这位卓越的思想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视为确定的真理。正如他的专著名称一样，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也是一个永恒的探索过程，“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永远在路上，而这条路是难有尽头的。

### 三、“道”与“言”：言说的间离作用

既然突破语言工具论的限制是一种可能，那么语言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存在或曰“自身缘构”，其言说功能和本质特征当然值得人们的关注。海德格尔曾经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承认自己“曾经把语言命名为‘存在之家’”（2020, p. 253）。后来他在论及语言的本质时指出：“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说话。我们现在是在诗歌中寻找语言之说话。可见，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就在所说之话的诗意图素（das Dichterische）之中。”（p. 269）因此，学界通常把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认识归结为：语言的本质是“诗意图的”和“存在之家”。

这种概括和归纳无疑是有依据的，因为能够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论述来加以佐证。然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海德格尔本人为了让语言的意义“敞开”，避免可能出现的“遮蔽”现象，是反对给予任何概念和意义以确定

---

<sup>①</sup> 这与王阳明所言的“去人欲，存天理”也是高度相通的，参见邓艾民（2021, p. 32, p. 40）。

性表述的，他怎么会在语言本质的问题上自相矛盾呢？其实，学界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定性，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位哲学家本人的认可，他使用“诗意图素”和“存在之家”的说法，恰恰是为了避免对语言的本质做出任何确定的评价。海德格尔在与一位日本采访者对话时，就明确解释道：“不，我所指的绝不是这种概念化。哪怕是‘存在之家’这个说法也没有提供出关于语言之本质的任何概念。”（2020，p. 109）

那么“诗意图素”和“存在之家”究竟是如何帮助海德格尔既避免了语言本质定义的“遮蔽”，又给出了对语言认知的意义表征呢？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海德格尔对此非常清楚，“道”和“名”都是无法定义的，甚至很难用语言表述，否则他就不会提出关于“遮蔽”与“去蔽”的语言表述问题了。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不可能产生于人类之前，而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逐渐完善而形成的。然而，语言一旦形成，在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无论是作为思维的方式，还是文明的载体，就都已经存在了。语言就如同一个牢笼，一张无形的大网，会牢牢地控制使用这一语言的每一个人。甚至当人还在母腹之中时，这种语言的影响就已经开始了，恐怕胎教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吧。当一个人慢慢长大，能够自如地使用语言交际时，在现实生活中他往往是很难感受到语言存在的。因为语言的意义自动生成机制，让人可以直接知晓所表征对象的意义。只有在以诗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语言中，人们才能够感受到语言的言说功能。这样一来，语言的言说功能和语言本质的体现，并非突显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之中，而只能是在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语言之中。“在诗歌中，我们所说的东西较不重要。关键是对一种特别的情绪的传达，作为对通向存在的某种在的方式的揭示。”（希尔贝克，2016，p. 638）

显然，诗的语言让语言表述与所描绘对象之间产生了审美感知的距离，可以避免语言自身具有的意义自动转换，也就在读者与事实之间生成了艺术的间离效果。这就是说，诗性语言的非功利性和艺术的间离作用，过滤了语言现实表征的实用性和利害关系，读者作为天然的阐释主体，也因此可以在这个“存在之家”中自主地各取所需。这里既不需要顾虑社会现存的伦理道德约束，也不必顾及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干涉，更不必把自我与作品中间的人物对位，文中的意义因此自由地释放出来。这时，语言的本质就易于感知，从而很难被“遮蔽”了。海德格尔的“诗意图素”和“存在之家”就是以“敞开”的方式，让语言的本质以可以感知的艺术方式，呈现在语言交流者面前，而并非是在阐释语言的定义。

## □ 符号与传媒（29）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2020, p. 7）明确写道：“如若我们一定要在所说之话中寻求语言之说，我最好是去寻找一种纯粹所说……纯粹所说乃是诗歌。”接着，他以特拉克尔的诗歌《冬夜》为例，阐明这首诗的标题“冬夜”并非特指某时某地的某个真实冬夜，而是以独特形象显示语言存在本质的特殊美。囿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仅引用海德格尔对该诗前四句的分析。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屋子已准备完好，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在海德格尔回来，语言是存在之家，前两句诗所命名的“雪花、钟声、窗户、降落、鸣响等”，“并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之中。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 “召唤入自身，而且因此总是往返不息——这边入于在场，那边入于不在场。”“落雪把人带入暮色苍茫的天空下。晚祷钟声的鸣响把终有一死的人带到神面前。屋子和桌子把人与大地结合起来。这些被命名的物，也即被召唤的物，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在命名中，获得命名的物被召唤入它们的物化之中了。物化之际，物展开着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因而向来就是逗留之物。物由于物化而分解世界。”“物化之际，物才是物。物化之际，物才实现世界。”（2020, pp. 12 – 14）显然，海德格尔回在这里说的“物化”就是语言言说的命名，也就是明确指出，在诗歌语言中才能够感觉到语言的存在。语言意义的释放似乎也只有在文学创作之中才能够高度实现。当一般的现实生活走到了尽头，文学就出现了。文学表征以其自身特有的超现实性的“召唤”，给予读者最大的自由，进入“存在之家”去自由驰骋，从而感受到文学语言对现实生活之“间离”，或曰构建符号性的现实维度（余红兵，2024a；Yu, 2024）。语言的本质也由此显现出来，这也是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反复强调的“语言说话”。

需要承认，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以揭示真理存在为目标，借鉴了道家学说的精髓，开辟了一条至今对语言学影响深刻的独特之径。从精神文化符号学来看，如果要进一步拓展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真正实现“道”（包括语言之“道”）的敞开，让语言切实地“在”，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化。其一，从“道”与“问”的立场出发，质疑现存的语言学理论和定义，采取返回自然的探索之路，通过不断的提问及其更新来打破束缚、解放思想。其二，应该把语言言说的对象作为活生生的“个性”，即认知行为的发出者，从反向认知的角度，深挖“道”与“意”之间的联系，将语言学研究由确定意义的思维范式转向意义释放。其三，充分发掘“道”与“言”的

互动意义生成机制，在文学语言的“间离”作用之中，探知语言作为独立存在的表达方式。

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多元复杂，难有止境，任何结论迟早都会被替代或更新。不仅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如此，本文观点论述展开之时，也是一种意义自反的开始。或许，学术研究的价值就不在于肯定，而在于不断否定。然而，自我否定应比“自以为是”要前进一步。这不仅和庄子的道言观相通，也应该和海德格尔关于“遮蔽”与“去蔽”之间博弈的“敞开”异曲同工吧？

#### 引用文献：

- 邓艾民（注）（2021）. 传习录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海德格尔（2020）.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索洛维约夫，弗·谢（2000）. 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2016）.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 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2013）. 庄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希尔贝克，吉列尔（2016）.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俊，郁振华，刘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颜世安（2022）. 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余红兵（2024a）. 生命的悲剧意识：关于“苦”的符号学漫谈. 文化艺术研究，1，38－44.
- 余红兵（2024b）. 语言活动的仪式性：一次语言符号学的冒险. 英语研究，2，待刊.
- 张杰，余红兵（2021）. 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 符号与传媒，22，1－13.
- 张杰，余红兵（2023）. 反向认知：自然主体论的思维范式阐释. 外语与外语教学，3，43－52.
- 张祥龙（2001）.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祥龙（2002）. “Dasein”的含义与释名（“缘在”）——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线索. 普门学报，7，1－15.
- 张祥龙（2009）. 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 哲学研究，8，65－76.
- 张祥龙（2022）. 中西印哲学导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Столович, Л. Н. (2005).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 Республика.
- Есаулов, И. А. (2017).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новое понимание. 3 – 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СПб. : Изд. РХГА.
- Cowley, S. J. (2019). Languaging Evolved: A Distributed Perspective.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5 (4), 461－482.

## □ 符号与传媒 (29)

Sebeok, T. A. & Danesi, M. (2000).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Yu, H. (2024). The Peculiar Case of Danger Modeling: Meaning-Gener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In Alexei A. Sharov & George E. Mikhailovsky (Eds.), *Pathways to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eanings in the Universe*, 363 – 376. Beverly: Scrivener Publishing LLC.

### 作者简介：

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与外国文学。

余红兵（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多伦多都市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符号学、比较哲学与认知。

### Authors:

Zhang Jie, senior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primary research areas include semiotics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Email: z-jie1016@ hotmail. com

Yu Hongb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Arts at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ultural semiotic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cognition.

Email: hongbing@ torontomu. ca